

旧上海的帮会

朱学范



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124054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旧上海的帮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6
230

旧上海的帮会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编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上海绍兴路5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86年8月

上海市报刊登记证第424号

定价 2.30 元

yt244/27

编辑说明

一、为了贯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向专题化、系统化发展的方向，我们除继续编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外，计划从今年起，根据上海近现代历史特点，陆续编辑出版一些专辑。这本《旧上海的帮会》是初步的探索。

二、本辑稿件来源，一部分是本会历年积存未发表的旧稿；一部分是国内书刊已发表的文章，经征得作者或有关方面同意转载；还有较多篇幅是新近约请熟悉帮会情况和参加过帮会的同志所写的综合性叙述，或亲身经历与见闻，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同志在公务繁忙中，为我们撰写专文，并亲题书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建猷同志长期从事会党历史研究，在患病休养中，为我们撰写序言，并审阅了部分稿件。在此统致谢意。

三、关于青帮、洪帮的名称，有多种提法，本辑各篇，基本上采用作者各自的叙述，不强求一律。

四、上海的帮会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当年亲历其事的人物大都去世，加之我们征集的对象不够广泛深入，因此本辑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有些情节，作者回忆互有出入，一时难以完全核实，只能诸说并存或适当加注，希望知情人补充、订正。对编辑工作中

的缺点错误,也希望读者批评指出,以便改进。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四月

序 言

魏 建 猷

中国近代的帮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产物，上海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集结点，研究上海帮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地方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海帮会是从鸦片战争后兴盛起来的，经过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辛亥以后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是其逐渐没落和消亡时期。它的兴盛和衰亡，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相联结。它在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官僚资产阶级随之出现的复杂历史条件下兴盛起来，一度扮演过时代的重要角色，又随民主革命的发展而日趋没落，终至消亡。

上海帮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积极、消极两方面都起过较大作用。它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曾大显身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但又常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相勾结，做过不少危害人民的勾当。特别在它的后期，如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租界当局的鹰犬，与蒋、汪伪特务勾结祸国殃民的罪行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帮会虽然消亡了，但是我们在十年浩劫期间，仍可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言论和行动中，隐约窥见帮会的阴影和流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深刻探求这些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上海帮会史的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但迄今仍属薄弱环节

节,大量的史料任其散佚,原有档案无人整理,活资料无人采访,旧的禁区无人过问,新的禁区无人突破,研究工作未曾开展,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仅见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及《上海小刀会起义》二书,此外,有质量的论著不多。至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帮会,几乎无人问津,近年始见到《杜月笙正传》和澳门出版的翻译本《杜月笙传》。须知民国以后,虽为上海帮会没落衰亡时期,但又是它的恶性膨胀时期,许多帮会头子广收门徒,长期利用上海租界,勾结中外反动势力,为虎作伥,大规模贩卖鸦片,开设赌场,横霸街坊,鱼肉人民,实为帮会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对此不加分析研究,实为憾事。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及其编辑室响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号召,打破“左”的观念,解放思想,根据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编辑整理了有关上海帮会的史料专辑。在本书中,既有黄金荣、杜月笙等的亲友门徒对其出身家世、“发迹”过程、重要事迹的真实回忆,又有个中人物对社会黑暗面的亲见亲闻;既揭露了这股邪恶势力的种种肮脏行径,又反映了某些帮会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革命力量引导运用的情况。本书以其生动丰富的内容,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比较翔实可信的资料,又可帮助青年一代了解旧上海的种种丑恶和帮会流氓的重重黑幕,从而增强警惕,激发对新中国、新上海、新生活的热爱。

本书的编辑出版,为帮会史研究开辟了先河,实属难能可贵,空谷足音,闻之登然而喜。本书所辑,大多属于亲见亲闻,虽或事隔多年,不免挂漏讹误,见仁见智,容有偏颇缺失,但多属第一手资料,足资参考。爰书鄙见,弁诸简端。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序言·····	魏建猷(1)
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	朱学范(1)
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段资料·····	吴成芳(21)
青帮早期组织考略·····	李世瑜(29)
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姜 豪(51)
洪门历史初探·····	姜 豪(68)
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	薛畊莘(87)
张仁奎与仁社·····	洪维清(108)
我的老师袁寒云·····	陈惕敏(115)
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	徐晓耕(126)
黄金荣事略·····	乡 波(131)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138)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黄振世口述、何国涛整理(167)
关于杜月笙·····	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195)

杜门话旧·····	黄国栋口述、罗醴泉整理(248)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郁咏馥(268)
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	黄永言(284)
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	黄炳权(293)
杜月笙与恒社·····	郭兰馨(300)
杜月笙与戴笠及军统的关系·····	郭旭(321)

张啸林的一生·····	朱剑良 许维之(342)
我所知道的张啸林·····	俞云九(347)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	石君(350)

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	王德林(357)
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顾叔平(360)

附录

恒社社章·····	(367)
恒社社员录·····	(369)

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

朱 学 范

一、帮会是旧上海工人工作中的大问题

李立三同志回忆一九二四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时，曾经说过，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第二次李启汉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立三同志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就运用他在安源对付洪帮的办法来对付青帮，结果五卅运动时，保护他的都是青帮的徒弟。他到上海，正是我考进上海邮局当邮务生的那一年。那时上海邮局内还没有青帮帮口，我对青帮还没有认识。以后我加入了青帮，并且自立帮口，利用帮会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对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有了相当认识，对立三同志的话有了实际的体会，而且在与世界各国工会交往中，深感中国工人运动中遇到的帮会问题及其复杂性，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中是罕见的。

民国以后，上海帮会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等操纵利用下，在政治上曾起过反动作用，成为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作过帮凶，许多帮会分子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群众。但是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人数为什么这样多？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历史的原因是什么？对帮会在工人运动中的

作用究竟如何具体分析？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现在就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一些回顾，希望对了解和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有所裨益。

从解放前全国来看，上海的在业工人最多，失业工人最多，入帮会的工人也最多。一九三二年以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上海的许多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情况严重，广大职工群众为谋生而竭力挣扎。上海邮局有一次招考信差，定额只录取六十八名，但报名投考的却有二千四百多人。一九三六年冬天，招考乙等邮务员，报名报考的有三千人，只录取了五十几人。当时人们称海关的职业为“金饭碗”，银行的职业为“银饭碗”，邮局的职业为“铁饭碗”，因此吸引了不少失学、失业和谋业的大、中、小学毕业的学生。可是，进了邮局要保牢饭碗也不容易，尤其是差工随时有被开革的危险，那些外商企业对信差投递邮件找个岔子，写一封信给邮局的外籍邮务长，往往就把一个信差的“铁饭碗”砸碎。上海邮局所以入帮的职工多，帮会的帮口多，除了各帮口争权夺利、扩张势力的原因以外，职工们为了寻求靠山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入帮会，是一个重要原因。外勤差工，如投递信件和往码头运送邮袋的信差、差役等，还有个保障人身安全的问题，更需要有人撑腰。尤其是信差中的劳逸程度相差很大，有些人为了在职务分工上能派到轻松的位置，或者在经济上盼求工资晋级快一些（邮局实行定期晋级工资制，邮务佐、邮务生、邮务员的工资晋级快慢相差半年），需要有人支持说话。还有少数人想捞点外快，因而加入帮会。

英商电车公司的职工入帮会的也较多，主要原因同样是为了保持饭碗，怕失业。电车公司的职业虽然不及海关、邮局，但当一

贺,表示难得。电车公司和海关、邮局一样,也有退职金即养老金制度。邮局规定,凡职工服务满二十五年的,退职时可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计算,发给二十五个月的养老金;超过二十五年的,每一年加发半个月。电车公司的养老金少些,凡服务满十五年,年龄已到五十五岁,退职时有二十四分之一的养老金,即满一年给半个月;服务满二十年的,满一年给一个月养老金。电车公司的职工和海关、邮局的职工一样,要想拿到这笔养老金,殊非易事,一旦被开除就不予发给。而电车公司的工人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开除。一九三七年从八一三战役到年底,短短五个月中共计被开除的职工就达一百多人。这年冬天,公司当局竟将工会代表和工会热心分子无故开除,并且利用巡捕房势力将其驱逐到外地。公司还随意给职工以各种惩罚,卖票工人差不多每月总有几次甚至十几次被喊到写字间被外国职员训斥或罚款,罚款轻则几角,重则一元两元不等。这种惩罚方式俗名“吃大菜”、“见阎王”。有些卖票工人要求减少这种处罚,就得在出事后托人向高级职员或查票员说情、送礼。还有一种处罚叫做“革班头”,就是勒令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如卖票工人被认为有揩油、漏票、错票行为,或者外国乘客写信表示不满,就不问是非曲直,被革几天班头,不给工资,还得每天到公司去等着,等三四天到十几天,一直到派班头为止。一年内革班头的次数一多,就会被开除。开车工人、机务工人以及查票员等,都有受到种种处罚以至开除的危险。

这种职业无保障,被中外资本家随意压迫、剥削的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被人欺凌蹂躏。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我国之有帮会，由来已久。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民间秘密团体，在家长制统领下，结合成种种名目不同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他们曾经用这种组织求得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时期用以发动斗争，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和地主。到了近代中国，这些组织的成员，从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扩大到现代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至中小民族资本家等阶层。这些组织的社会地位也从秘密存在状态逐步转到公开合法。这些组织的组成分子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社会上的一股特殊的力量。

上海职工大众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若将入帮会的职工人数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等，以及地方帮口如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湖北帮、江北帮等等的人数，那在全市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组织里，有不少人是与帮会有联系，并以帮会为靠山的。这些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以及各地方帮口，都是广大职工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斗争中的互助团体。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因素所造成的。职工大众为了求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联合，需要互助。当然，他们是不可能从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和帮会这些组织中得到出路的。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还没有达到靠拢共产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由于帮会本身的落后性和狭隘性，与入帮的职工大众的切身利益也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因此在职工大众团结斗争的进程中，这些组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有可能成为统一战

线的对象之一。另一方面，帮会中有与职工大众切身利益相对立的因素，按照李立三同志的说法，是反映在帮会内的阶级斗争。这是研究帮会应注意的问题。

二、我是怎样利用杜月笙的关系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的

（一）进入杜门的经过

邮务工会成为上海七大黄色工会（其余六个工会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业工会、南洋烟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华商电气公司工会）之后，陆京士为了巩固对邮务工会的控制和要在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出人头地，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和上海邮局内挑选了十一人（包括他自己一共十二人），于一九三一年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杜月笙的学生陈君毅的介绍，拜杜月笙为先生，第一批是他和我二人，都是邮务生。第二批是邮务生赵树声、张克昌、肖清珊，邮务员傅德卫，交通部的杨克天，邮政总局视察员缪鸿俊，上海邮局邮务佐刘心权、于松乔，信差徐子琴，听差杨德龄。杜月笙对邮局职工投入他的门下，认为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中国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

我们进入杜门后不久，杜月笙在高桥兴建的杜氏祠堂落成，国民党和政府的显要人物从蒋介石起都送礼祝贺。陆京士和我送不起重金厚礼，想出一个既不花大钱又使杜月笙有面子的办法，就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专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这在当时算得别开生面，人们感到新奇，杜月笙认为邮局也对他捧场，颇为得意。我们私刻纪念邮戳，照邮局规章本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政当局慑

于声势,只好默许。

我入杜门后不久,参加发起成立恒社。这个社名是章士钊提出的,取意是“如月之恒圆”,用以称颂杜月笙。陆京士提出,参加恒社的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是入杜门的学生一律都作为社员。恒社有一个圆形社徽,图案中间是一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新月。钟表示为发声之源,“声”字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恒社有一个理事会处理社务,陆京士和我都是常务理事。

(二) 创办大公通讯社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上海没有一家专发工人运动消息的通讯社。一九三二年我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当时正值一二八抗战以后,上海工商业因受战争影响,不景气情况更加恶化,中外资本家企图把所有损失都转嫁给工人,延长工时,减少工资,关厂停业,开除解雇,失业工人达数十万。工人为求生存,纷起斗争。各业各厂工人的罢工此起彼继,但是收效很少,大多数罢工归于失败。原因除资方的顽抗和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以外,罢工大都是自发的、分散的,缺乏相互支援,力量单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是邮局出身的,深知消息传递的重要性,于是创办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逐日发布工人运动重要活动的通讯稿。通讯社设在九江路华萼坊,我任社长,邵虚白任编辑,叶翔皋任总务,开始时记者二人是卢慕琴、余耀球,后来有邵飘飏。市总工会在南市小世界对面的酱业公所里,我每天晚上不是从市总工会直接到大公通讯社,便是从别处去通讯社,总之,每晚必到,同邵虚白商量研究发通讯稿的事。我通过在各主要报馆工作的恒社弟兄,如申报馆的余空吾,新闻报馆的唐世昌,时事新报馆的蒋湘青,时报馆的

蒋忠义、蒋忠道兄弟等，采用大公社通讯稿，从此，见报的罢工消息逐渐增多，尤其是申报登的工潮消息最多。有些小厂罢工，工人自己到大公通讯社来报告，或者打电话来。通讯社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各报馆付的稿酬，另一是我同周学湘、叶翔皋、李梦南（五洲固本肥皂厂工会）、邵虚白等开设的合作印刷所的收入。印刷所设在南市方浜桥金家坊，经理是叶翔皋，管印刷工务的是彭文美（即彭向梅），专门承印各工厂、企业的工会和工人的来件，有些印刷所不敢印的罢工传单等，就送到合作印刷所来印。因此，营业情况不错。

大公通讯社受到社会重视，与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全国邮务总工会和邮务职工会联合发起“巩固邮基运动”有很大关系。当时邮工要求：一、裁并储汇局；二、停止航空公司一切津贴；三、维持邮政一切用人制度；四、邮政经济专养邮政。五月十二日上海邮工罢工，到了二十三日，北平、天津、开封、太原、济南、南京、安庆、福州、郑州、杭州、洛阳、青岛、烟台、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徐州、宁波、松江等地的邮局工人都罢工，声势很大，全国震动。汪精卫把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祺、交通部邮政司司长龙达夫撤职，并训令上海市长吴铁城劝导立即复工。上海社会各界闻人名流虞洽卿、王晓籁、史量才、林康侯、张公权、杜月笙、潘公展等七人出面调停，全国邮务总工会和邮务职工会的代表陆京士、张克昌、齐嘉谋、傅德卫、史贻堂、劳杰明、林卓午和我等八人接受调解。由上列十五人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提出解决的办法，于五月二十六日全面复工。所谓巩固邮基运动，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不过借题做文章。从酝酿到罢工，邮工争到的切身利益很少，仅每人每月加了津贴二元，并对年终奖金的核发标准和假期，稍有改善。因为邮工罢工影响全国，大众关心，而消息由大公通讯社独家发布，各报采用，使大

公通讯社的声誉大增，从而改变了各报不重视工运报道的状况。

(三) 组织毅社

我进入杜门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对邮务工会的控制，组织毅社是为了巩固在上海市总工会中的地位 and 扩大在租界上各行各业工会中的势力。

从一九三二年起，我担任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到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上海市总工会暂准备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则因内部矛盾而拒不承认，租界当局更不理睬。由于上海的主要工厂企业大部分设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因此市总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微弱。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海市总工会接到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训令，略云：“查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第二节第八项及修正指导民众运动方案第二项，关于工人团体组织，均有县市区域内之工会得联合成立总的组织之规定，兹据前项规定，由本部制定县市总工会组织准则，以为各县市制定总工会组织规章之准绳。”于是上海市总工会开始取得合法地位。

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除主席委员外，有五个常务委员，都是帮会中人。我自己是杜门中人，周学湘、邵虚白、叶翔皋、李梦南、龙沛云等五个常务委员投在金廷荪门下。我在一九三四年初在市总工会内部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方如升、万邦和、沈桴等，接着在上海邮局内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王震百、肖浦松、李克荪等数人，以后就广泛铺开。在租界上一些主要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云飞和祥生汽车公司、纱厂、橡胶厂、机器厂和轮船拖驳业里，都收有“学生”。租界以外的以

• • •